



孙燕

Sun Yan

孙 燕 内科肿瘤医学专家。1929年2月1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56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国家抗肿瘤药GCP中心主任，协和医科大学教授。我国肿瘤内科的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在开发新抗肿瘤药、常见肿瘤综合治疗和扶正中药促免疫作用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生于民族危亡的时代，和多数其他同龄人一样，从幼年对祖国有明确的概念

我生于河北农村一个普通人家，父亲为一般职员。从开始懂事的时候所接触到的就是民族危亡。1941年父母送我到县城的昌黎中学附属小学寄读。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半中国，城里有日本兵和伪军，出入城门要对他们表示些敬意，否则就会遭到打骂。这些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最重要的是对祖国的地位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懂得亡国的痛苦，向往自由富强。我从小学将毕业的时候受到同学父亲一位在昌黎东街开业的米大夫的影响，就立志学医报国。这一志愿激励我不断学习，同时也部分支撑了我克服后来人生道路中的蹉跎。1943年小学毕业后转到北京汇文中学。那时人民生活很苦，学校吃的是混合面丝糕和咸菜。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了，但美梦很快就被“接收大员们”的贪污腐化给破灭了。同时，父亲失业、肺结核

病复发，家庭陷入困境。我从高中开始只能靠奖学金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学业。1947年我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就读。1949年新中国成了以后，我怀着极大的激情参加了各项运动，努力改造自己。195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5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1958年春我被“候补”为“右派分子”，1958年5月下放到昌平上苑乡麦庄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给当地农民看病。以后在1959年2月调到医学科学院西山造林队做医生。1959年10月我被摘去“右派”帽子，分配到肿瘤医院工作。但没有想到生活在“另册”一下子就是20年。

那时，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在吴恒兴和李冰两位院长直接领导下创建了肿瘤内科治疗小组。虽然条件十分艰苦困难，但治疗和科研工作迅速发展起来。到1965年正式成立了专科病房。不久，十年浩劫来了，这些成绩反而成了吴恒兴、李冰“搞高精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我更顺理成章地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1970年1月我带着全家到甘肃定西地区医院安家落户。在那里我抢救了许多垂危的病人，和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1972年5月我们调回北京工作，开始了扶正中药促免疫和主持肺癌综合治疗的科研工作。1975年5月我参加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医疗队，多次赴个旧在那里开展医疗、普查和科研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工作热情更高了，不断开始了多项新药的临床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1979年12月我作为第一批访问学者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赴美国休斯敦在著名的M. D. Anderson肿瘤中心从事研究工作。1982年初回到肿瘤医院担起发展学科的任务。1983年晋升为主任医师，协和医科大学临床肿瘤学教授，并在1984—1992年间担任内科主任，靠着大家的共同努力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内科成为一个国内最大、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承担着大量临床治疗、科研课题和教学任务的专业

科室,并且带动全国同道共同前进,使学科有了很多发展。我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起任国家抗肿瘤药GCP中心主任,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常说,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学科的迅速发展,我是不可能成为院士的。

40余年来,我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包括1978年国家科学大会奖、多次省部级奖和2004年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也曾得到过很多荣誉,包括被评为教书育人先进个人(1991)、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名医(1993)、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1994)、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2004)、优秀共产党员(2005)、中国医师奖(2005)、北京市医德楷模(2007)和杰出保健工作者(2005)等。在国际上获得过国际自然免疫及生物反应调节剂大会奖(1985)、亚洲临床肿瘤学会George Wu纪念奖(1999)和木村喜代二纪念奖(2001)。

我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WHO)癌症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十年(1991—2002)、国际抗癌联盟(UICC)原老委员会委员(2000—)、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CCRF)(2002—)和亚洲临床肿瘤学会(ACOS)(2001—2005)副主席和主席(2005—)、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委员会和麻醉品委员会委员(1996—)、人事部、卫生部医学专业考试委员会副主任(2001—)、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2002—),并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中医研究院、郑州大学医学部、南方大学、第三军医大学、山东肿瘤防治所、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汕头医学院肿瘤医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天津市第二中心医院肿瘤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等担任客座教授。我是中国医学论坛报肿瘤学专刊、中国肺癌杂志和中国肿瘤姑息治疗杂志主编,癌症进展杂志、中国新药杂志副主编,中华肿瘤杂志、中国肿瘤临床、日本临床肿瘤学杂志(JJCO), *Seminars in Oncology*, *International J Experimental and Clinical Chemotherapy* 等期刊的编委。

二、开创我国实体肿瘤内科治疗专业

1959年我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当时称日坛医院),领导要我开创新的学科——肿瘤内科。当时只有5张病床,2位医生,抗癌药只有4种。我和周际昌医师在院领导的直接领导下边学习边实践,开展医疗和科研工作,很快就有了进步。1965年病床增加到了30多张,科里也有了5位青年医生,2位进修医生和8位护士,肿瘤内科已初具规模了。从1960年起,我们试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开发的抗肿瘤新药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取得突出成果。论文在1962年于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报告,引起轰动,被称为“药物治疗有效控制肿瘤的典范”。后来我总结:I期病人手术后辅助应用N-甲酰溶肉瘤素10年治愈率达到100%;II、III期和复发病人为67%;甚至一些已发生肝、骨转移的精原细胞瘤病人经过治疗后,得以长期生存。这项工作获得了1978年科学大会奖和卫生部甲级成果奖。此外,我们开创的乳腺癌晚期术前化疗、胸壁复发的局部治疗、肺转移的治疗,使一部分病人存活期长达10~30年。还开展了胸腔积液的局部治疗和头颈部癌的动脉化疗等,在当时均在国内属于首创。

十年浩劫开始后内科被拆散,我被下放到甘肃,周际昌到山东,蒋秉东到青海。直到1972年周总理亲自把我和几位专家调回到北京,才又重新组建了内科。如今,内科人才济济,已经成为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我国最大肿瘤内科专业,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每年承担着大量临床治疗和新药研究任务。目前,我负责的国家新药临床研究中心近5年来每年完成了120多项从各个方面来的临床试验任务。比较重要的新抗肿瘤药物如卡铂、优福定、紫杉醇、泰索帝、诺维本、草酸铂、健择、美罗华、赫赛汀等新药的临床试用大多数均是由我们完成的。近几年完成或正在进行项目如多西紫杉醇、血管内皮抑素(恩度)、参一胶囊、西妥

昔单抗(C-225)、立达霉素、治疗肝癌的新药 Nimorubicin、三氧化二砷和阿霉素磁珠等,以及国际多中心项目如 025(来曲唑和三苯氧胺的对比研究)、INTEREST(吉非替尼和泰索帝对比治疗 NSCLC 的二线对比研究)、日本开发的新药 S-1 等,都是由我作为 PI(主要研究人员)主持进行的。

三、中西融合,开创“祛邪扶正”治疗肿瘤新模式

1960 年我脱产一年师从三代世医姚孝武学习中医。下放甘肃定西时,我发现当地黄芪很多。回到北京以后,就决定从黄芪入手开展对扶正中药的研究,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的效果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多年来,包括在 M.D. Anderson 肿瘤中心和美国同行的反复试验的结果,我们证实传统中药黄芪、女贞子、芦笋、仙灵脾等可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恢复,抑制肿瘤病人过多的 T 抑制(Ts)细胞的活性,保护肾上腺和骨髓功能。辅助放射、化疗应用,能够提高病人的远期结果。从女贞子提取了一种有效成分——齐墩果酸,通过多中心双盲临床研究证明有良好疗效。我从事的扶正中药研究被评为卫生部、天津市及中国医学科学院成果,并获得第一届国际自然免疫与生物反应调节剂大会奖。我们为配合临床治疗所研制的贞芪扶正颗粒、胶囊、扶正女贞素和固元颗粒等中药制剂自正式投产以来,畅销国内外,并获得四项专利,贞芪扶正胶囊和颗粒已进入我国基本药品名单。

此后,我对肿瘤治疗中应用“祛邪一扶正一强化治疗一扶正”的模式作了研究和新的阐述,并在淋巴瘤和小细胞肺癌综合治疗的治愈率方面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我十分热衷于扶正中药对抑癌基因调控作用的研究和对中医“阴虚”的探讨两项研究课题。中医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应格外珍惜。这也是我国医学界对世界医学做出贡献的可能途径之一。

我对扶正中药的研究成果曾在美国、日本、

德国、法国、瑞士、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和大陆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报告,并在相应的杂志或论文集中发表。《美国医学杂志》(JAMA)曾专门发表评述,誉其为“东西方会谈共同调节免疫学的阴阳”;美国全国性报纸 *USA Today* 和我国《健康报》等都做过报道。1996 年在第 63 次香山科学会议上被认为是我国肿瘤学领域内应用现代科学从事传统医学研究的典范。台湾报纸介绍我时,说我是:“能够将中医治病的观点融入临床实践的著名西医专家”。

四、继续倡导肿瘤综合治疗

1959 年我院建院之初,几位元老在讨论临床肿瘤学发展前途时就明确应当走综合治疗的方向,并积极推动综合治疗的实践和研究。目前,很多肿瘤医院在学科以外还有综合治疗组或研究组。可以不夸张地说,在临床肿瘤学中多数重大进展都和综合治疗分不开。1976 年我在参加《实用肿瘤学》编写时,与吴桓兴、金显宅两位前辈讨论肿瘤综合治疗的内涵,通过讨论我们写下了以下定义:“根据病人的机体状况,肿瘤的病理类型、侵犯范围(病期)和发展趋向,有计划地、合理地应用现有的治疗手段,以期较大幅度地提高治愈率和生活质量。”今天看来,这是以人为本,重视病人机体和疾病两个方面,并且不排斥任何有效方法,目标明确的全面定义。我在几位元老故去后,根据他们的嘱托继续在全国倡导综合治疗的概念。同时,每次讲课都不忘介绍他们对发展我国临床肿瘤学的贡献和献身精神,并且推动创建了亚洲临床肿瘤学会(ACOS)颁发的吴桓兴纪念奖;在全国乳腺癌会议上颁发的金显宅纪念奖,用以奖励在学科和乳腺癌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我国专家。2006 年我们将分别在北京颁发第二届吴桓兴纪念奖和在重庆颁发第三届金显宅纪念奖。

1999 年我和谷铎之教授总结了肿瘤医院 40 年开展肿瘤综合治疗的成果和经验。在头

颈部癌、食管癌、乳腺癌、肺癌、鼻咽癌、淋巴瘤和中西医结合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很多已经在全国推广。我们认为,进入新时代以后由于强调循证医学更需重视积累有关综合治疗的经验和资料,特别是全国性大规模的协作研究;并且积极提高临床研究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治疗更为有效,为国争光,在国际学术界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也给广大患者带来真正的希望。

五、在工农大众之中我收获很多,由于我勤于临床实践成为协和医科大学的名医

到农村我如鱼得水。1959年春节,在我下放的昌平农村,正流行着小儿麻疹。看到很多孩子在发高烧,我便一个人留在村里,没有回家过年。我走东家串西家为孩子们查看病情,为抢救病重的孩子毫不犹豫地抽出了自己的血。1966年春我作为食管癌高发区林县医疗队的成员在林县工作,那年正遇上脑膜炎流行。为了抢救病儿我口对口人工呼吸,开展大剂量阿托品治疗,并为县举办培训班;为了抢救急症病人我因为O型血为病人输血。1970年我们全家到定西安家落户。刚刚上班的一天,一个刚刚满月的男孩子被父亲抱进门,孩子得的是重症肺炎,呼吸已经十分微弱,儿科医生认为已经无望。我们立即进行口对口和用手进行人工呼吸,并及时用上高剂量阿托品和抗生素。经过一夜的观察孩子有了自主呼吸,体温也恢复正常。看着自家的独苗得救了,孩子的父母千恩万谢,从此孩子改名“敬燕”,和我们认了干亲。至今,敬燕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位得了败血症的妇女已被家人穿上了“寿衣”,我们积极抢救硬是把她救活了。为此,老乡们将“定西名医”的称号送给了我。我后来将多年来研制的贞芪扶正胶囊和颗粒转让给他们生产,成为当地一个缴税最多的支柱产业。

1975年以后,我多次到个旧下矿到现场调查、送医送药,和那里的工人和同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一位矿工肺部肿块较大又有胸水,我

们积极给予化疗和处理胸水,在得到一定控制后,进行了手术。1997年我和黄国俊教授重到个旧,访问了这位老工人,随行的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此事,一时成为佳话。三年前,一位重要肺癌病人在香港治疗失败后来我院求治,我们给予化疗和靶向治疗使其病情得到一定缓解。那时,我们仔细分析并证明了他的“多发骨转移”实际是这位军人过去的肋骨骨折。因此大胆和兄弟单位合作为他进行了根治手术。目前病人健康存活3年多,当地政府特别来信表示感谢,认为对他们来说是“奇迹”。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惩罚的成分,本来到农村工矿都是好事。它可以使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互相理解,树立为他们服务的理想。我多年来下乡、下矿的经历对我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1993年我被评为协和医科大学的名医,当时在其中是最年轻的两人之一。多年来我由于为了祖国富强和坚信努力不会白费,不但勤于学习和临床实践,而且无论在条件较好或逆境中都很敬业。经我们治疗痊愈的病人遍布海内外。多年来参加国内外首长和知名人士的保健工作,每年均受到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嘉奖。多次出国到美国、朝鲜、新加坡和柬埔寨执行任务都能较好地完成。其实,我只是虚心学习,对病人无论何人都认真对待而已。

我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向病人提供最新、最好的治疗使他们尽快康复。我喜欢《永不放弃》那部电视剧,甚至想和他们合作,因为我有太多故事和感受提供给他们。我爱我的病人,从医半个世纪我深切体会我们的病人多数都是十分优秀的。他们能经受痛苦、克服困难,和医生一道战胜疾病。他们很多成了我的好朋友,对我帮助也很大,我对他们心存感激。当我为病人作出奉献的时候,也从病人那里得到了欢乐和鼓舞。我永远不会忘记,1970年早春一个寒冷的日子,在全家就要下放甘肃的前夕,3个经过我治愈的淋巴瘤病人,蹬着平板车,送来了

一个木箱子。当时物质十分匮乏,这箱子是他们用自己家里和四处捡来的木板拼凑在一起钉成的啊。我也忘不了自己抢救的后改名“敬燕”的男孩和他的一家;忘不了经我治愈的小女孩,执意做我的义女如今已经长成为列车员小立杰……病人给我的那份真情和挚爱,促使我不能不加倍努力工作。但我更忘不了晚期癌症病人“救救我”的痛苦呼唤,以及他们临终前“希望你们能早日制伏癌症”的嘱托,所以我必须为早日制服肿瘤加倍努力工作,尽管我理解这不是我这代人所能完全达到的目标。我只能义无反顾地“向着目标奔跑”,手扶着犁向前看。

六、以教学为自己学术生命的延续

我喜欢教学。站在讲台上,我感觉好极了,因为我可以畅快淋漓地把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科学的理解以及多年来积累的临床经验,传给年轻的医生们,使自己的学术生命得以延续。很多学生也说:“听孙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不但学到新知识,而且学到方法,终身受益。”我认为:肿瘤学是一门既艰难又有趣的学科,需要不断学习、研究和实践。其间有太多的课题要做,一个人的知识、精力和时间太有限了,就是不吃不喝也做不完,因此需要培养大批新人。

另一我情有独钟的是每周的内科大查房。几十年来,把新入院的病人,特别是疑难病人拿到全科参加的大查房是内科很有名的活动。很多进修医生在完成一年学业临离开时都深情地说,他们通过大查房收获最大,学到了很多书本没有的知识,也看到全科是如何认真对待每一位病人的。我经常告诉学生:面对病人我们不可以有半点不懂装懂,医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而且是立竿见影的科学。作为医生,要谨慎敬业,马虎不得。你可能治过一千例病人,但到一千零一个可能出错。我关心全国内科肿瘤学的发展,致力于全国同道的团结。我把帮助、培养全国各地有为青年医师当成自己分内的事。我对学生既慈爱又严厉。科里有个人人皆知的“老规矩”: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绝不能

与病人发生争吵,更不允许收受病人的财物。我要用高尚的医德、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医术深深影响年轻的一代。通过讲课、培养研究生、办进修班、学习班等渠道我们的学生已经有数千。所以很多同行开玩笑说:“你和孔夫子一样弟子三千。”

七、把个人荣辱和祖国命运相联系

194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校长告诉我作为5名优秀学生之一,我将得到去美国继续学习的奖学金。然而,由于当时父亲患病和对新中国的渴望,我决定留下来和同胞们一起迎接中国伟大的历史转折。

前面已经说过,新中国建立以后,我积极参加各项活动,1952年入团,1954年参军,1956年曾经荣立二等功。但是在1958年以后,我的论文只能由别人拿到国际会议上去报告。我写的论文不能署名尤其是不能署在前面。在此,我十分感谢我的两位恩师对我的爱护,他们冒着风险在很多论文中仍然把我的名字署在后面。李冰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坦然说:“报告是我做的,稿是孙燕写的,出书怎能不写他?”

对于这些那个特定时期的不公正的待遇,我心里很坦然:那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多数人都被触及了,我个人受到牵连不足为怪。

我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改革开放的1979年。1978年国庆节前后,我在外边执行保健任务,李冰院长找我和殷蔚伯到办公室,告诉我们可以参加留美考试。我当时以为这只是做做形式,便问李冰“万一我们考中会放我出去吗?”因为在两三年前我国组织肿瘤学代表团赴美访问时,需要有一位肿瘤内科专家,她和吴院长无论怎么推荐保证,最后也未同意我去。当时李冰回答:“我不能保证一定让你们出去,但放弃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当时实在不知道中央已经开始在拨乱反正。在美国的那段日子里,我以中国人特有的勤奋和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受到国外同行们的尊敬。1980年5月我第一次参

加在圣迭哥召开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时,有关中国淋巴瘤临床特点的10分钟报告被安排在淋巴瘤专题的最后,但来听的除了一大屋子听众以外还有专门开车从洛杉矶赶来的Rappaport教授等。在报告后大家的提问竟延长了两小时,其中包括了很多在美国工作的台湾同胞。他们很可能并不注意孙燕是谁,主要是希望了解中国了解大陆。1993年我应邀到新加坡会诊,由于多次在电视台露面,走到街上也有人打招呼表示问候。1995年我在当年亚洲临床肿瘤学会(ACOS)报告对我国淋巴瘤特点和治结果的分析以后,提出了治疗淋巴瘤

的新观点。友好的同行赞誉为“中国模式”。我清醒地明白这是由于对中国的崇敬。这种爱国情怀,同样在欧洲和美国学术会议的讲台上都一次次地被强化。爱国心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根深蒂固,面对名利我们不可能不顾国家的利益而只考虑个人。这没有什么商量,甚至没有什么动人的思想过程。

回想一生走过的路,在最近对全院青年医生的谈话中我说:“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为了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做一个爱国者、好医生、好老师,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检讨到老。”